

浅析日澳安全关系的发展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张 亮

〔内容提要〕2014年日澳宣布建立“特殊关系”以来,两国的安全合作由非传统安全领域向传统安全领域迅速扩展,并在东海、南海等地区海洋争端问题上展开了密切协作。日澳安全关系的这种发展,受到美国亚太政策调整、日本寻求实现“正常国家”的目标、澳大利亚追求地区影响力等多重因素的推动,并对中国海洋利益的维护和地区安全环境的稳定造成了复杂影响。虽然受到日澳安全利益错位、澳国内反对声音、中澳关系发展等因素的制约,日澳关系难以走向结盟,但中国仍需密切关注日澳安全关系的发展走向并采取恰当措施,以减小其不利影响。

〔关键词〕日本 澳大利亚 安全关系 东海 南海

〔作者简介〕张亮,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国际关系专业2017级博士研究生

日本和澳大利亚作为西太平洋北部和南部的两个地区大国,其双边关系的发展不仅对彼此具有重要意义,对于地区形势也有重要影响。长期以来,作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北锚”和“南锚”,日本和澳大利亚在美国领导的同盟体系内展开了密切的多边合作,与此同时,两国在经济、政治、安全等领域的双边合作也取得了重大进展。近年来,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和世界权力结构的调整,两国在安全领域的合作走上快车道,其合作范围由非传统安全领域迅速向传统安全领域扩展,并在地区安全问题上积极协调,频频发声,对亚太地区的安全形势以及相关地区问题的妥善解决,都带来了一些值得关注的影晌。

一、日澳安全关系发展的历程及内容

日澳安全关系的发展,按照其机制化水平和合作内容,可以依2007年《日澳安全合作共同宣言》(Japan-Australia Joint Declaration on Security Cooperation)的签订、2014年日澳宣布建立“特殊关系”(Special Strategic Partnership for the 21st Century)为时间节点,划分为三个阶段,即2007年以前的初期阶段,双方安全合作的机制化程度较低,并且以非传统安全合作为主;2007年至2014年,机制化水平显著提高,但仍以非传统安全合作为主;2014年至今,双方安全合

作的机制化水平继续提升，同时合作内容向传统安全领域迅速扩展。

在第一个阶段，日澳两国除了在美国领导的同盟体系内继续深化安全合作之外，也开始在双边安全合作上做出尝试。1995年5月，日澳签署了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建立伙伴关系联合声明》（Joint Declaration on the Australia-Japan Partnership），对两国长期以来在经济、政治、安全等方面的共同利益进行了确认，开启了日澳关系全面发展的新时期。^①《声明》尤其提到两国未来要在联合国维和行动、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澳大利亚支持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等领域加强合作，^②从而使得日澳安全合作走上了发展的快车道。2001年“9·11”事件的发生，对世界安全形势和美国的全球战略都造成了巨大冲击，在此背景下，2002年5月，日澳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创造性的伙伴关系”（Australia-Japan Creative Partnership），并着重强调了加强两国在反恐等问题上合作的必要性。^③当年10月，印度尼西亚度假胜地巴厘岛发生了针对澳大利亚的恐怖袭击，造成了包括88名澳大利亚人和15名日本人在内的180多人死伤。这一事件引起日澳两国的强烈谴责，以此为契机，两国在反恐领域的合作迅速升温。^④双方不仅在双边领域互相支持，积极配合，也在机制化的多边对话渠道中展开合作。^⑤在这一时期，日澳的安全合作主要集中在反恐、防扩散、联合国维和行动等非传统安全领域。

第二阶段的开始，以2007年3月《日澳安全合作共同宣言》的签订为标志。根据协议，日澳双方建立起了两国外交部长、国防部长的年度对话会议机制，以及由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组成的“2+2”联合对话机制（Japan-Australia Joint Foreign and Defence Ministerial Consultations），从而使日澳双方在安全和外交事务上的合作得以更加机制化。^⑥日澳签订的这份安全协定，是战后日本与美国之外的国家签订的第一个防务协定，根据协定设置的2+2联合对话机制，也是日本首次与美国之外的国家展开这种措施。^⑦当年9月，两国又制定了一份行动

① 汪诗明《澳日关系：由“建设性伙伴关系”到准同盟——兼评澳日〈防务与安全声明〉的签署》，载《现代国际关系》，2007年第8期，第28页。

②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Joint Declaration on the Australia-Japan Partnership”, May 26, 1995, http://www.mofa.go.jp/region/asia-paci/australia/join_au.html.

③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Joint Press Statement by Prime Minister John Howard and Prime Minister Junichiro Koizumi ‘Australia-Japan Creative Partnership’”, May 1, 2002, <http://www.mofa.go.jp/region/asia-paci/pmv0204/joint.html>.

④ 李旭东《冷战后的日澳政治安全关系》，载《日本学论坛》，2007年第3期，第66页。

⑤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Holding of U. S. -Australia-Japan Counter-Terrorism Talks”, September 21, 2005, <http://www.mofa.go.jp/announce/event/2005/9/0921.html>.

⑥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Japan-Australia Joint Declaration on Security Cooperation”, March 13, 2007, <http://www.mofa.go.jp/region/asia-paci/australia/joint0703.html>.

⑦ 张景全《从同盟角度看日澳结盟趋向的原因及影响》，载《东北亚论坛》，2008年第3期，第48-49页。

保障计划以促进共同宣言的实施,^①两国之间的安全合作由此获得了法律上和制度上的保障,机制化水平大大提高,合作内容也大大扩展。《共同宣言》同时确认了两国继续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展开合作的意愿,澳大利亚国防军(Australian Defense Force, ADF)和日本自卫队(Japan's Self-Defense Forces, JSDF)在人道主义援助和救灾行动(humanitarian assistance and disaster relief, HADR)等任务中展开了更加密切的合作。比如,在2010年巴基斯坦洪灾的救援行动中,在2011年日本里氏9.0级大地震和随即发生的海啸灾难中,在2013年菲律宾的超强台风灾害中,澳大利亚国防军和日本自卫队都展开了密切的协同与配合。^②可以看到,在日澳安全关系发展的这一阶段中,其机制化水平已经有了大幅提升,其内容则仍以非传统安全合作为主。

第三阶段从2014年日澳“特殊关系”的建立开始,至今仍在进展中。2014年7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Shinzo Abe)访问澳大利亚期间,与时任澳大利亚总理阿博特(Tony Abbott)一起发布了日澳建立“特殊关系”的联合声明。声明以专章形式强调了日澳在安全和防务领域的合作计划。^③双方同时签署了《日澳武器装备和技术转移条约》(Agreement between the Government of Japan and the Government of Australia concerning the Transfer of Defence Equipment and Technology),为两国之间展开装备合作提供了法律基础。此后,日本一度成为澳大利亚高达500亿澳元的新一代潜艇项目最热门的竞标者之一。^④日澳“特殊关系”联合声明还以专章形式表达了日澳两国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上的关切,其中尤其提到,双方具有在公海海域自由航行和飞越的自由,享有自由进行贸易而不受阻碍的自由,双方反对在东海和南海地区任何以武力和恫吓方式单方面改变现状的行为,倡导有关各方要以和平的方式在国际法的框架下解决问题,同时敦促东盟和中国尽快达成南海行为准则(Code of Conduct in the South China Sea, COC)。^⑤

美国特朗普(Donald Trump)政府上台以后,为了应对美国可能出现的战略收缩,日澳双方在继续加强双边防务合作的同时,也将如何确保美国对亚太地

^①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Major elements of the Action Plan to implement the Japan-Australia Joint Declaration on Security Cooperation”, September 9, 2007, <http://www.mofa.go.jp/region/asia-paci/australia/action0709.html>

^② The National Interest, “Watch Out, China: Japan and Australia Are Getting Closer”, May 6, 2015, <http://nationalinterest.org/blog/the-buzz/watch-out-china-japan-australia-are-getting-closer-12820>.

^③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Prime Minister Abbott and Prime Minister Abe Joint Statement ‘Special Strategic Partnership for the 21st Century’”, July 9, 2014, <http://www.mofa.go.jp/files/000044543.pdf>.

^④ The Australian Strategic Policy Institute, “The strategic case for Option J: an alternative view”, April 8, 2015, <https://www.aspi.org.au/the-strategic-case-for-option-j-an-alternative-view/>.

^⑤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Prime Minister Abbott and Prime Minister Abe Joint Statement ‘Special Strategic Partnership for the 21st Century’”, July 9, 2014, <http://www.mofa.go.jp/files/000044543.pdf>.

区的安全承诺列入了双边合作内容。2017年4月,日澳在第七轮“2+2”会谈中,不仅明确肯定了美国对于亚太地区安全的重要作用,还提出要采取措施以促进日澳美三方在亚太地区的安全合作。^①由此,这一阶段的日澳安全合作,不仅向传统安全领域迅速扩展,在地区安全问题上加强了协调和介入,也从被动的配合美国的亚洲再平衡政策,进一步发展到主动拉拢和确保美国介入亚洲事务,以构筑防华联合阵线。

二、日澳安全关系发展的动因与影响

日澳两国安全关系的迅速发展,与国际局势的变化和世界权力结构的调整,以及日澳两国的国内政治走向和利益诉求具有密切联系,是多重因素共同推动的结果。

第一,美国亚太政策的调整以及美国国内政治的发展对日澳安全关系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2009年奥巴马政府执政以后,积极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为了集中精力遏制中国的发展,美国积极优化其亚太同盟体系,鼓励盟国之间加强相互联系,以在美国力有不逮时,填补地区权力真空。这就为日澳安全关系的迅速发展创造了非常有利的外部环境。事实上,在日本和澳大利亚仍旧分别把对美关系作为自身外交政策基础的情况下,没有美国的认可和鼓励,两国安全关系的深度发展将是不可想像的。2017年特朗普政府执政以后,则从另一个方向促进了日澳安全关系的发展。特朗普在对外政策上具有强烈的“美国优先”和“孤立主义”倾向,强调维护美国的国内经济利益,对于介入世界上其他地区的事务不感兴趣,对于维护与美国盟国的关系也很冷淡。在此背景下,澳大利亚总理和特朗普的首次通话就因难民问题爆发了激烈冲突。出于对美国的全球领导力下降的担忧,严重依赖于美国安全承诺的日澳两国,具有了更为强烈的结盟自保的动机,两国的安全合作也因此更加深入。

第二,日本安倍晋三政府上台以来,为了实现“正常国家”目标,恢复军事大国地位,积极发展与其他国家的安全关系,以寻求国际支持。在国内,安倍政府积极谋求解禁集体自卫权,修改和平宪法,并于2014年4月和2015年9月先后通过“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与安保相关法案,使日本具有了参与国际军事冲突和对外从事战争的可能与能力。日本右翼所谓“正常国家”的目标在相当程度上得到了实现。^②在国外,安倍政府不仅努力争取国际上对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的理解和支持,还通过制造和升级地区矛盾,渲染地区紧张气氛,以为日本的国内政治操作制造合理性。澳大利亚在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问题上的

^①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Seventh Japan-Australia Foreign and Defence Ministerial Consultations(‘2+2’)”, April 20, 2017, http://www.mofa.go.jp/a_o/ocn/au/page3e_000692.html.

^② 赵英 《“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对日本经济政治的影响》,载《东北亚学刊》,2016年第3期,第10页。

支持态度^①，在国防装备项目上与日本的密切合作，在参与地区热点问题上的积极配合，都使其成为安倍政府积极拉拢以扩大外交阵线的重要目标。

第三，澳大利亚政府对参与地区事务，提高澳大利亚国际影响力的热情越来越高涨。澳大利亚自陆克文时期起，提出了“中等强国外交”的理念，力图破除对美国亦步亦趋的外交战略，以积极独立的外交政策参与地区事务，提高本国的国际影响力。^② 陆克文下台之后，这一以参与地区事务提高本国国际地位的政策基调并未改变。2013年版的澳大利亚《国防白皮书》(Defence White Paper 2013)明确将印太地区的稳定尤其是东南亚地区的稳定，以及建立在规则基础上的稳定的全球秩序列为澳大利亚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③ 通过高调介入东海、南海等东亚海洋争端问题，澳大利亚可以彰显自己的地区存在，确立自己的地区影响力。而与日本的安全合作，则不仅可以放大这种影响力，提升话语权，还能够在减轻本国对美国的安全依赖的同时，提高自己的军事能力。

在此背景之下，日澳的安全合作开始向传统安全领域迅速扩展，并在东海、南海等地区海洋争端问题上积极介入。日澳的相关举动已经对中国的国家安全利益和地区安全环境带来了一些不利影响。

第一，日澳安全合作对中国国家安全利益的维护造成了一定压力。例如，东海问题是中日之间的，包括中日东海海域划界争端、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主权归属争端、东海油气资源开发争端等在内的一系列复杂问题，澳大利亚与此无关，却横加干涉。2012年9月11日，日本抛弃中日在东海问题上“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共识，悍然对我领土钓鱼岛发起“国有化”运动。为了应对日本挑衅，中国逐步实现了海监船在钓鱼岛海域的常态化执法巡航。^④ 同时中国在2013年11月划定东海防空识别区，以加强对这一地区的空中态势管控，这是完全符合国际法和国际实践的举动，却引来了与此事毫无关联的澳大利亚的无端指责。澳方声称中国宣布划设防空识别区的时间和方式“都不适当，对区域稳定无益”，甚至召见了中国驻澳大使，要求中方解释“为什么伤害澳大利亚的利益”。^⑤ 2014年6月，在第五次日澳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2+2”会议上，日澳双方不仅重点讨论了东海和南海问题，还表示强烈反对任何国家以武力方式

① 新华网《澳总理称日本是最好朋友 力挺安倍解禁自卫权》，2014年07月09日，http://news.xinhuanet.com/mil/2014-07/09/c_126727578.htm。

② 唐小松、宾科《陆克文“中等强国外交”评析》，载《现代国际关系》，2008年第10期，第15页。

③ Australia Government, Department of Defence, Defence White Paper 2013, May 3, 2013, <http://www.defence.gov.au/whitepaper/2013/>。

④ 刘江永《钓鱼岛争议与中日关系面临的挑战》，载《日本学刊》，2012年第6期，第3页。

⑤ 中国网《澳大利亚应认清形势摆正自己的位置》，2013年12月8日，http://opinion.china.com.cn/opinion_63_88263.html。

单方面改变东海和南海现状。^①这种对中国国家利益的粗暴干涉行为，严重影响了中澳关系的发展，伤害了两国的共同利益。

第二，日澳安全合作对于地区的安全与稳定造成了不利影响，这在南海问题上表现的尤其突出。南海问题是中国与南海地区相关国家在海洋权益归属问题上的双边分歧，与任何第三方无涉。日本和澳大利亚却在此问题上积极介入，唯恐天下不乱。澳大利亚不顾越南等相关国家在南海进行了多年岛礁建设的事实，妄加指责中国在南海海域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以服务地区航行安全的合法行为，称中国不应再推进南海岛礁建设，中国“扩展在南海的势力范围”，“这种做法与中国期望达到的效果恰恰相反”。^②日本则操弄国际法的尊严以谋一己之私。2013年1月，菲律宾单方面将南海问题提交国际仲裁，之后在中国“不接受、不参与仲裁的”立场下，日本籍法官柳井俊二主导强行开启了仲裁程序。2016年7月，南海非法仲裁结果出炉，中国外交部郑重声明，该裁决是无效的，没有拘束力，中国不接受、不承认。澳大利亚外长毕晓普却公然为此非法仲裁结果背书，称中国“无视裁决将严重违反国际法，付出巨大声誉成本”。^③

日澳等国的相关举动，其目的不是为了解决与中国的争议，也不是为了维护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而是为了否定中国在相关地区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同时，借助新闻媒体等话语霸权歪曲事实，抹黑中国，造成中国野蛮霸道，欺压弱小，不遵守国际法和国际秩序的形象，进而挑动相关国家抱团对抗中国。这种将地区局势搞乱、搞混，使相关问题扩大化、复杂化的举动，与本地区国家积极维护相关地区稳定的努力不相符合，与本地区人民希望局势降温的愿望不相符合，与域外国家应当发挥的建设性作用也不相符合。^④

三、日澳安全关系的走向及中国的对策

日澳安全关系的迅速发展，已经引发了日澳由准同盟关系走向同盟关系的讨论。^⑤但是，由于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目前看来，日澳两国难以走向真正的结盟关系。

第一，日澳两国在国家利益诉求和威胁认知上存在明显不同，这将从根本

^①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Fifth Japan–Australia Joint Foreign and Defense Ministerial Consultations(‘2+2’)”, June 11, 2014, http://www.mofa.go.jp/a_o/ocn/au/page3e_000188.html.

^② 南海网《澳大利亚总理称中国不应再建设南海岛礁 中方回击》，2015年9月23日，<http://www.hinews.cn/news/system/2015/09/23/017821473.shtml>。

^③ 中国外交部网站《2016年7月14日外交部发言人陆慷主持例行记者会》，2016年7月14日，http://www.fmprc.gov.cn/web/fyrbt_673021/jzhs_673025/t1381550.shtml。

^④ 中国外交部网站《王毅驳美日澳涉南海声明：和平维护者还是搅局者？！》，2016年7月26日，<http://www.fmprc.gov.cn/web/zyxw/t1384720.shtml>。

^⑤ 朱海燕《日澳关系“同盟化”的新发展及其前景》，载《现代国际关系》，2014年第8期，第44页。

上制约日澳安全关系的深入发展。对于日本而言,中国不仅是其在东亚地区恢复军事大国地位和帝国荣光的长期战略对手,两国在东海划界和钓鱼岛等问题上也具有现实利益冲突。中日舰船、军机已在相关海域空域发生多次激烈交手,^①并存在擦枪走火乃至爆发冲突的危险,这使得日本日益将中国作为其首要的国家威胁。反观澳大利亚,维护国家安全和地区稳定,促进国家经济发展一直是其首要政策目标,在地区问题上追求国际影响力不应以损害澳大利亚的经济利益甚至国家安全为代价。^②澳大利亚虽然将中美的竞合关系列为未来一个时期影响澳大利亚安全环境的首要因素,但是也对中美以建设性方式处理相互关系乐见其成,对于澳大利亚而言,恐怖主义、网络安全等问题是更为急迫的问题。^③有鉴于此,澳大利亚愿意与日本发展关系平衡中国影响力,却并不愿被拖入一场战争。

第二,由于中日关系的持续紧张,澳大利亚各界已经对日澳安全关系的过快发展和其明显的“防华”倾向表达了强烈的反对声音。这些意见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日本发展与澳大利亚的安全关系,甚至走向“准结盟”,其目的是为了构建反对中国的联盟,这一联盟因而对日本意味着更多安全,对澳大利亚却意味着更多危险。^④第二,积极发展对华关系,促进双方经贸增长和地区稳定,符合澳大利亚的根本利益,任何有可能危害中澳关系的举动都是愚蠢和错误的。^⑤第三,澳大利亚不必要,也不能在中日之间选边站,澳大利亚的国家利益在于与中日两国都保持良好和密切的关系,一个排他性的军事联盟将带来巨大风险。^⑥以上这些反对声音表明,澳大利亚国内对日澳安全关系的性质和影响都存在很大分歧,这是澳大利亚政府在决定其对日安全政策时所不得不考虑的重要因素。

第三,中澳两国越来越庞大的贸易往来和经济合作关系,促使澳大利亚在涉及地区事务和对华事务时采取更加谨慎的立场。自2007年开始,中国就已成为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国,两国的贸易额逐年迅速增长,澳大利亚对中国

^① 中国国防部网站 《国防部就日方挑衅我巡航战机事答记者问》,2016年7月4日, http://www.mod.gov.cn/info/2016-07/04/content_4687271.htm。

^② Hugh White, “China will inflict pain if Abbott blunders on”, December 24, 2013, <http://www.smh.com.au/comment/china-will-inflict-pain-if-abbott-blunders-on-20131223-2zueu.html>。

^③ Australia Government, Department of Defence, 2016 Defence White Paper, Strategic Outlook, February 25, 2016, <http://www.defence.gov.au/Whitepaper/AtAGlance/Strategic-Outlook.asp>。

^④ Andrew Carr and Harry White, “Japanese security, Australian risk? The consequences of our new ‘special relationship’”, July 8, 2014, <https://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14/jul/08/japanese-security-australian-risk-the-consequences-of-our-new-special-relationship>。

^⑤ Hugh White, “China will inflict pain if Abbott blunders on”, December 24, 2013, <http://www.smh.com.au/comment/china-will-inflict-pain-if-abbott-blunders-on-20131223-2zueu.html>。

^⑥ 国际在线 《澳大利亚各界谨慎看待澳日“新型特殊关系”》,2014年7月10日, <http://gb.cri.cn/42071/2014/07/10/6891s4610656.htm>。

的市场依存度逐年升高。2013年两国贸易额达到1509.19亿美元，是当年澳日贸易总额的两倍还多。^①2014年11月，习近平主席访问澳大利亚期间，与时任澳大利亚总理阿博特一起将中澳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宣布实质性结束中澳自由贸易协定谈判。^②澳大利亚的经济成长尤其是作为支柱性产业的矿产业的成长近几年也越来越依赖于中国市场。这使得澳大利亚在对地区事务发表意见时，不得不考虑这种意见可能对中澳关系产生的影响，并进而采取谨慎态度。

有鉴于此，日澳在可见的未来难以走向真正的同盟关系，但是考虑到日澳安全合作已经对中国和中国周边地区安全环境产生的负面影响，中国仍需对其发展态势保持警惕并认真对待。中国需要区分主次，从日澳两国在利益目标和政策选择上的不同入手，制定差异化、针对性的斗争策略，以减小日澳安全关系发展带来的不利影响，维护地区的长久和平与稳定。

第一，日本急于恢复所谓“正常国家”的企图，以及在对华领土争端问题上的强硬挑衅姿态，使得中日之间擦枪走火的可能性日增，日澳安全关系也因此主要被日本用作以军事联盟围堵中国的战略的一环。有鉴于此，中国在继续加强与日本的交流和互信，努力争取双边问题以和平与合作的方式解决的同时，也要对日本可能的军事冒险行为保持警惕，做好预案。对于日本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小动作不断，中方要及时予以坚决打击，防止其侥幸心理膨胀。比如，2016年8月，中方曾一度向钓鱼岛海域派出多达14艘公务船进行巡航维权活动，另外还有超过230艘渔船在附近海域展开捕捞作业，^③使得日本在我钓鱼岛的“国有化”闹剧彻底失败，沉重打击了日本的侵权行为，以斗争的方式维护了这一地区的和平局面。

第二，澳大利亚与中国并无结构性矛盾和领土争端问题，澳大利亚在日澳安全关系框架内频频对地区问题发声，对中国提出质疑，主要是基于寻求大国国际影响力的考虑，同时也有对中国意图的不信任。中国在发展对澳关系问题上，除了打好经济牌以限制澳大利亚那些不负责任的破坏中澳关系的举动外，也要进一步加强中澳在政治、军事、文化等领域的交流，以促进两国在地区事务上的相互了解和信任。中国要努力促进中澳外交与战略对话的持续展开，努力促成“一带一路”建设和澳大利亚“北部大开发计划”对接，进一步提升中

① Australia Government, 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and Trade, “Australia’s Trade At A Glance”, <http://www.dfat.gov.au/trade/australias-trade-at-a-glance/index.html>.

② 人民网《中方同澳大利亚一致决定建立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14年11月17日，<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4/1117/c70731-26041641.html>。

③ 凤凰网《史无前例！钓鱼岛附近的中国海警船增至14艘》，2016年08月08日，http://news.ifeng.com/a/20160808/49738740_0.shtml。

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水平。^① 同时,努力提升中澳两国军事交流和合作的水平,加强两军在多边军事演习、人道主义救援等方面的合作。双方的民间往来和人文交流也应成为中澳关系发展中的重要内容。国之交在民相亲,通过从官方到民间,从政治到文化的全方位交流和沟通,中澳之间也将在地区事务上对彼此的利益关切保持更多的理解和尊重。

第三,打铁还需自身硬,地区领土争端和安全问题的和平解决是防止域外势力插手鼓噪的根本。中日东海问题的和平解决需要双方共同努力,南海问题由于涉及的国家更多,涉及的利益争端更广,尤其需要中国发挥智慧,承担起负责任大国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的义务。目前,中国已经与东盟国家顺利并提前达成“南海行为准则”框架,这为适时开展“南海行为准则”实质性磋商创造了良好基础。^② 接下来一个时期,中国政府应继续履行2002年《南海各方行为宣言》(the Declaration on the Conduct of Parti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DOC)所提出的各项承诺,促进《宣言》全面有效完整落实。尤其重要的是,中国政府应继续努力创造条件,使围绕南沙岛礁的具体争议回到由直接当事方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的轨道上来。只要中国与东盟国家继续增进互信,深化合作,排除可能来自域内、尤其是域外的干扰,中国与东盟国家完全有能力以自主方式制定出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的地区规则。

结 论

总之,日澳安全关系的发展,受到国际环境和地区安全局势以及日澳两国国内政策发展的多重因素影响。日澳两国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给地区带来了一些贡献,而其在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因其强烈的排他性正在给地区带来不利影响。2014年的上海峰会上,习近平主席提出了“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新安全观,为努力走出一条共建、共享、共赢的亚洲安全之路指明了方向。^③ 有关各方应摒弃那种以结盟求安全、以对抗求安全的旧思维,努力以相互间的交流与互信、共识与合作,积极践行共享安全观、合作安全观,共同打造东亚地区的命运共同体,为维护东亚地区的长久繁荣与稳定作出贡献。

[收稿日期: 2017年11月21日]

[修回日期: 2017年12月29日]

[本文编辑: 王婷婷]

① 新华社《王毅与澳大利亚外长毕晓普举行第四轮中澳外交与战略对话》,2017年2月7日,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7-02/07/c_1120427079.htm。

② 新华社《王毅:营造良好环境,排除各种干扰,稳步推进“南海行为准则”谈判》,2017年6月12日,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7-06/12/c_1121130717.htm。

③ 新华网《习近平:应积极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2014年05月21日,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4-05/21/c_1110792359.htm。

Author: Dr. Hong Nong is the Director of Research Center for Oceans Law and Policy at National Institute for South China Sea Studies. She is also the Executive Director of Institute for China–America Studies. She is concurrently an adjunct fellow with China Institute , University of Alberta , Canada , and China Center for Collaborative Studies on the South China Sea , Nanjing University

Review and Reflection of “Dong Lang Incident”

Tian Shichen

Abstract: The outcome of “Dong Lang Incident” is a win–win situation for both China and India. It represents China’s typical diplomatic value of mutual benefit and win–win approach. The incident also marks the beginning of a new round of strategic competition between China and India. China needs to double think the cause of this incident and its management process. Three points need to be highlighted. Firstly , China fails to transfer its strategic advantage into tangible security assets and there are no effective Rules of Engagement for its border troops. Secondly , China needs to re–construct its national security system so as to systematically deal with emergency issues among relevant agencies. And finally , China needs to make both strategic and tactic adjustments in response to India’s strategic changes.

Keywords: China; India; strategy, “Dong Lang Incident”

Author: Tian Shichen , Ph. D. student of Wuhan University China Institute of Boundary and Ocean Studies , and research fellow of China Center for Collaborative Studies on the South China Sea , Nanjing University

A Brief Analysis of the Development of Japan–Australia Security Relationship and Its Influence on China

Zhang Liang

Abstract: Since 2014 when Japan and Australia announce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pecial relationship” , the security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from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field to the field of traditional security is expanding rapidly. The development of this security relationship , driven by multiple factors such as the U. S. Asia–Pacific policy adjustment , Japan’s seeking to achieve the target of normal state , Australia’s pursuit of regional influence , and constraint by the different interests between these two countries , the Australian domestic opposition , the development of Sino–Australian relations. The security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two sides , not only causes some pressure to China , but also makes the regional security environment more complex , therefore China needs to pay close attention and takes appropriate measures to reduce the adverse effects.

Keywords: Japan; Australia; security relationship; East China Sea; South China Sea

Author: Zhang Liang. Ph. D. student of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for Peaceful Development of Cross - Strait Relations , and Graduate Institute for Taiwan Studies , Xiamen University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Sea Power Thinking of Mahan and Corbett

Liu Xinhua and Wang Lijian

Abstract: American Mahan and Britain Corbett were famous sea power strategists in the world. Although their ideas often coincided , they were very different in terms of background , theoretical content and influences. Their ideas were bor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and early nineteenth century , but Mahan's theory was born in America which needed to be expanded overseas urgently , and Corbett's was born in Britain which was maritime hegemony. Both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maritime significance , but Mahan emphasized that sea power was superior to land power , and Corbett placed on relativity of sea power , sea-land coordination. Both emphasized the importance of the navy , but Mahan focused on the construction of an offensive fleet , and Corbett advocated the construction of a balanced fleet of offensive and defensive , and explained his idea of limited war. Mahan's theory had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maritime situations , and Corbett's theory had an important influence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American Navy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and the current U. S. maritime strategy. A systematic comparison of their thinking can provide valuable intellectual resources for formation of sea power strateg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 maritime power.

Keywords: Mahan; Corbett; sea power; naval strategy

Authors: Liu Xinhua , professor of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ZNUFE) , adjunct research fellow of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for Territorial Sovereignty and Maritime Rights (CICTSMR) , Wuhan University; Wang Lijian , postgraduate student of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Trump Administration's Arctic Policy: Internal and External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Trend

Yang Songlin

Abstract: In January 2017 , Trump was inaugurated as the forty-fifth president of